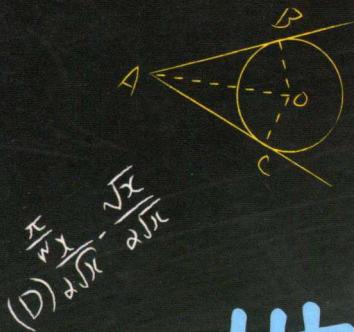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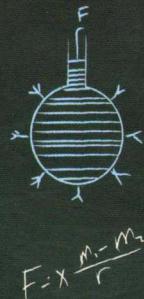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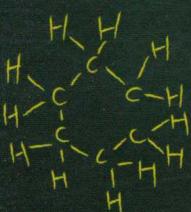
The Smartest Kids in the World: And How They Got That Way



世界上最 聪明的 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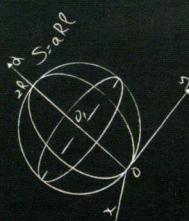
$$E=mc^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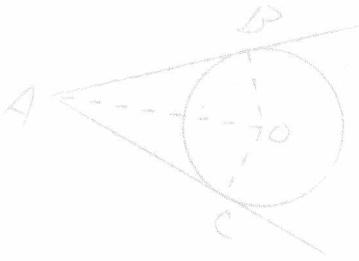


[美]阿曼达·里普利 著 王少博 译

我们知道的越多，
就越能引导孩子走上成功之路。

每个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教育难题，
芬兰、韩国、波兰如何教出最聪明的孩子？





(D) *Yankee*

世界上最聪明的孩子

$$E=mc^2$$

[美]阿曼达·里普利著 王少博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上最聪明的孩子 / (美) 里普利著；王少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5

书名原文：The Smartest Kids in the World: And How They Got That Way

ISBN 978-7-5086-4116-4

I. ①世… II. ①里… ②王… III. ①基础教育－教育工作－研究－国外 IV. ①G63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 011499 号

The Smartest Kids in the World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Amanda Riple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Simon & Schuster,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出售

世界上最聪明的孩子

著 者：[美]阿曼达·里普利

译 者：王少博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9.5

字 数：194 千字

版 次：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京权图字：01-2013-8895

书 号：ISBN 978-7-5086-4116-4/G · 972

定 价：3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主要人物

德 国

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 (Andreas Schleicher)

经合组织 (OECD) 德国科学家。他帮助创建了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以下简称 PISA)，这一测试旨在评估全世界 15 岁的孩子对参与社会所需知识与技能的掌握情况。

托马斯·内维尔·波斯尔思韦特 (Thomas Neville Postlethwaite)

英国科学家，是“世界各地的孩子所了解的知识”这一课题研究的开发者，也是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的导师。

美 国

斯科特·贝瑟尔 (Scott Bethel)

俄克拉荷马州萨利索 (Sallisaw) 的一位橄榄球教练，也是金的数学老师。

马克·布兰查德 (Mark Blanchard)

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 (Gettysburg) 某高中的校长。汤姆是该校的学生。



夏洛特 (Charlotte)

金的母亲，俄克拉荷马州萨利索某小学的教师。

斯科特·法默 (Scott Farmer)

俄克拉荷马州萨利索某学区的教育学监，负责监管学区内所有校长，金就读的学校在他所管辖的学区。

德博拉·吉斯特 (Deborah Gist)

罗得岛州教育厅厅长。

埃利娜 (Elina)

芬兰人，她 16 岁时离开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去美国密歇根州科隆 (Colon) 做一年交换生。

厄尼·马滕斯 (Ernie Martens)

俄克拉荷马州萨利索金就读高中的负责人。

威廉·泰勒 (William Taylor)

华盛顿特区一所公立学校的数学老师。

韩 国

车炳哲 (Cha Byoung-chul)

韩国首尔江南区教育办公室一个学习宵禁执法分队的负责人。

李载延 (Lee Chae-yun)

在韩国首尔拥有5家分店的某家教连锁机构老板。

埃里克 (Eric)

美国交换生，18岁时离开明尼苏达州明尼通卡 (Minnetonka)，2010~2011学年在韩国釜山做交换生。

珍妮 (Jenny)

曾在美国生活过的韩国学生，并在韩国釜山与埃里克成为好朋友。

李周浩 (Lee Ju-ho)

韩国原教育科技部部长，也是拥有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

安德鲁·金 (Andrew Kim)

因在韩国最大的在线培训机构，也是韩国最大的私人辅导学校之一的 Megastudy 执教而发迹的英语老师。

波 兰

米罗斯瓦夫·汉德克 (Miroslaw Handke)

化学家，曾于1997~2000年担任波兰教育部部长，期间他积极推进教育改革。

乌祖拉·斯堡卡 (Urszula Spałka)

波兰弗罗茨瓦夫市某高中校长，汤姆为该校交换生。

汤姆 (Tom)

美国交换生，17岁时离开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2010~2011学年在波兰弗罗茨瓦夫市做交换生。

保拉·马歇尔 (Paula Marshall)

百麦 (Bama) 公司驻俄克拉荷马州、中国和波兰分公司的 CEO。

芬 兰

金(Kim)

美国交换生，15岁时离开俄克拉荷马州萨利索，2010~2011学年在芬兰皮耶塔尔萨里(Pietarsaari)做交换生。

蒂纳·斯塔拉(Tiina Stara)

金在芬兰皮耶塔尔萨里交换时的芬兰语老师。

苏珊(Susanne)

金在芬兰皮耶塔尔萨里第一个寄宿家庭的妈妈(当时金在她家寄宿了6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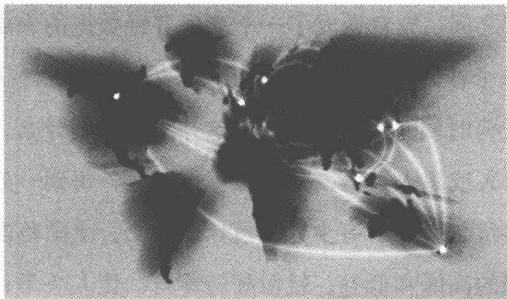
海基·沃里宁(Heikki Vuorinen)

蒂斯迪拉(Tiistilä)学校的老师。这所学校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移民。学校位于芬兰赫尔辛基郊外的埃斯波(Espoo)。

开篇

谜团

数据热图：世界上有一小部分国家，那里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学习数学、阅读和科学等学科的同龄人。这表明，发展批判思维能力。



在我就职于《时代》(Time)及其他杂志社的大半职业生涯中，总是尽力回避有关教育的选题。如果编辑让我写一篇关于学校或考试的文章，我就提出有关恐怖主义、飞机失事或流感爆发之类的选题。这一招通常都很管用。

虽然我没有明说，但教育类新闻听上去实在让人提不起劲。这些文章的标题往往采用板报字体，还会加上一些铅笔涂鸦。文章中满是无根无据的美好愿望，引用的话大多出自成人之口，孩子只会出现在照片中，安静地微笑。

后来，编辑让我写一写华盛顿特区主管公立学校的一位颇具争议的新领导人——米歇尔·李(Michelle Rhee)。我对此人知之甚少，仅有的一点了解是她穿细高跟鞋，接受访问时常说“胡扯”这样的词。¹所以，我觉得这会是个好故事，尽管它会让我陷入教育的迷雾。

但是，在那层迷雾中，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我花了几个月去跟

孩子、家长、老师，还有那些采用创新方式研究教育的人交流。很快，我就意识到李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但她还不是这里最大的谜团。

真正的谜团是：为什么有的孩子能学到那么多知识，有的孩子学到的东西却少得可怜？

突然之间，教育变成了一个充斥各种数据的领域。从一个社区或教室到下一个社区或教室，对于哪些事情正在发生或哪些事情没能发生，我们比任何时候知道得都多，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无论是富人或穷人社区，白人或黑人社区，公立或私立学校，每到一处，我都发现孩子们懂得的事情总会有多有少，这没什么意义。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数据也显示出类似的高峰和低谷，就像翻转穿行、让人头晕目眩的过山车。出现这些高低起伏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金钱、种族或民族因素。但这些并非全部的原因，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在其中发挥作用。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又写了一些有关教育的文章，也一再遇到这个谜团。在华盛顿特区的肯勃小学里，我看见过五年级的学生乞求（一点也不夸张）他们的老师，点他们上台解答黑板上的长除法题。如果得出的答案正确，他们就会握紧拳头，轻轻地叫一声“太棒了”。事实上，在这个社区，大约每周都会有一人遭到杀害，社区人口的失业率也高达18%。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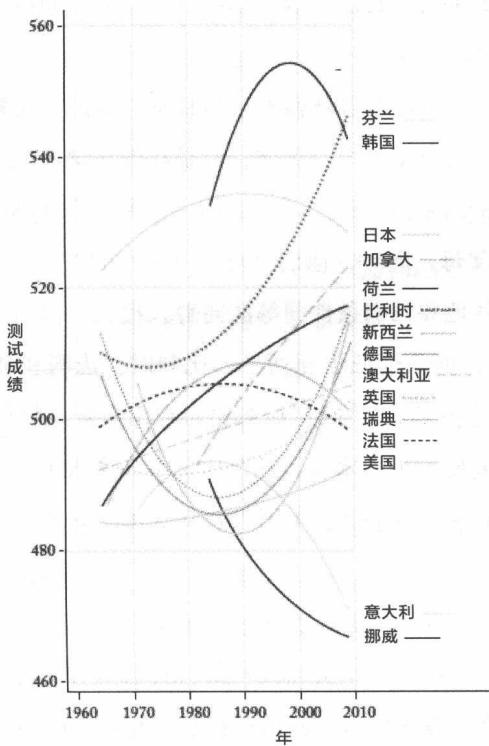
在其他地区的一些学校，我却看到了百无聊赖的小孩子，当像我一样的陌生人走进教室时，他们就会抬起头，看看我是否能弄出点花样（心中祈求老天保佑最好是如此），好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让下一个钟头不再那么无聊。

有一段时间，我告诉自己，这就是我们在不同社区的学校之间、不同校长或不同老师所负责的课堂之间可能会看到的差别。在我看来，有的孩子只是运气好，因为大多数紧要的差别都与金钱和特权有关。

然而，当我某天看到下页这张图表时，还是感到震惊。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学生的测试结果基本上保持平稳，但是那只

是个例外。让我们看看芬兰吧，它从世界上垫底的落后国家一跃而升为世界第一，甚至都不需要片刻喘息。它的邻国挪威尽管几乎没有贫困儿童，学生的测试结果却一步步滑向低谷。还有加拿大，以前的测试结果平平，却渐趋上升到可与日本比肩。如果说教育只是文化的一个部分，那么文化能出现如此剧烈且迅速的变化吗？



各国的变化：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同国家针对本国的孩子进行了18次不同的测试。经济学家卢德格尔·沃斯曼因（Ludger Woessmann）和埃里克·哈努谢克（Eric Hanushek）根据这些测试的结果制作了一张图表。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可能发生，也的确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变得更好或是更糟了。³

孩子的各项能力有时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起落，全世界都一样，这种变化没有规律可循，但也让人满怀希望。在华盛顿特区，我发现的

情况更有趣。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设法让其所有孩子，包括那些家境富裕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与大多数国家相比，美国的教育情况很有代表性，不太好也不太糟。但在少数几个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却出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情况。几乎所有孩子都在通过数学、科学和阅读的学习发展自己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他们不仅要牢记各种知识，还要培养解决问题和适应环境的能力。也就是说，他们所接受的是如何在现代社会中生存与发展的教育。

对这些作何解释呢？总体而言，与日本、新西兰和韩国的一般孩子相比，美国孩子的家境要更为优渥，但是在数学学习能力上，美国孩子却远不及另外3个国家的孩子。⁴在美国，条件最为优越的孩子们既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同时，他们自己也在享誉世界的名校里接受教育。然而，与世界各地和他们条件同等的同龄人相比，他们的数学测试结果仅排名第18位，得分远低于新西兰、比利时、法国和韩国等地与他们一样衣食无忧的孩子们。⁵而生活在比弗利山庄豪宅里的孩子在数学测试上的表现还要低于平均水平，甚至比不上加拿大（离得不远，就是我们的邻居）孩子的平均水平。美国大众认为的“好的教育”，看上去相当普通。⁶

起初，我告诫自己要抵制炒作。我们的教育成果是否排名世界第一，这真的很重要吗？排名第10又如何？我们的小学生在国际测试中表现得很好，尤其是在阅读方面。问题出现在数学和科学两门学科上，而且当孩子们长到十几岁以后，问题更加突出。美国十几岁的孩子在数学逻辑思维测试中的表现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排名第26位。可是，那又如何？我们的青少年在国际测试中的成绩也曾多次处于平均水平或低于平均水平，这对我们的经济发展都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为什么在将来就会产生重大影响呢？

美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多元国家。虽然我们的K-12^①教育体系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之处，但还有其他许多优势能让人眼前一亮，不是吗？我们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而且我们会继续投入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的研发经费。⁷与地球上其他大多数地方相比，在这里创业也容易得多。而且，美国一贯推崇勤奋工作、自给自足的价值观。⁸

但是，当我作为一名记者到各地采访时，发现这世界原来早已改变。⁹高中毕业之前，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度过的2300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在俄克拉荷马州，有一家专为麦当劳做苹果派的公司，它的CEO告诉我，在经济衰退期间，很难雇到足够多能够胜任现代化工厂工作的美国员工。那些手工揉面团和把苹果派放到包装盒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工厂需要的是具备阅读能力，能够解决问题并善于沟通的员工，而俄克拉荷马州的高中和社区大学符合这些要求的毕业生数量根本不够。⁹

万宝盛华（Manpower）^②的员工和办事处遍布全球82个国家，它的负责人曾说过这样的话：无论在什么地方，销售岗位最难找到合适的员工。以前，销售人员必须要有厚脸皮，还得会打高尔夫。然而，产品和金融市场在这些年里变得更加复杂，任何人（包括客户）都能获取到相关信息，人脉不再意味着一切。为了取得成功，销售人员必须对那些越来越精细和更加个性化的产品有细致的了解，就像它们的研发工程师一样。¹⁰

突然间，平庸的学术能力成了沉重的包袱。如果没有高中文凭，在纽约连一份清洁工的工作都找不到，也不能加入空军。然而，美国仍有四分之一的孩子从高中辍学，再也没有返校。

就在不久前，没有哪个国家的高中毕业率比美国高。但截至2009年，已有大约20个国家的高中毕业率超过了美国。¹¹在一个知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的时代，为什么我们的孩子所掌握的知识都达不到他们应有

① K-12指美国人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所接受的12年的基础教育。——译者注

② 万宝盛华集团为全球企业提供人力资源服务。——译者注

的水平呢？这些问题在多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一个国家的多样性、贫穷或幅员广阔？我们的劣势主要在于政策、文化、政客或家长的失败吗？

我们告诉自己，至少美国在培养更具创造性的孩子，他们可能不擅长电气工程，却拥有据理力争、创造发明以及尝试一切的勇气。但是，是否有办法确认我们的想法是对的？

北欧的神秘“机器人”

教育专家们曾不遗余力地解释不同国家的测试结果完全不同的原因。他们特意长途跋涉前往各个学校参观，也听取了政界人士和各学校校长的报告，并在返回之后将所有的收获制成电子幻灯片向大家进行展示。但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抽象得令人抓狂。

以测试结果名列世界第一的芬兰为例，美国教育专家将芬兰描述得跟天堂一样好。在那里，所有教师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孩子们也都受到爱护。他们坚信芬兰之所以如此幸运，部分原因是芬兰的儿童贫困率很低，而美国儿童贫困率相对较高。按照这种逻辑，如果我们不先消除贫困，教育问题将永远无法解决。

贫困给人们的感受非常直接。美国儿童贫困率为20%左右，这是我们国家不甚光彩的一面。我们国家的贫苦孩子，在他们本不该品尝苦痛的年纪承受了太多的艰辛。他们在家里几乎学不到什么知识，因此非常需要学校的帮助。

然而教育的谜题无法简单地通过消除贫困就能得到解决。如果贫穷是问题的根源，那么我们如何解释挪威的情况呢？高税收、全民医保，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些使得挪威成为北欧的高福利国家之一。和芬兰一样，挪威儿童贫困率不到6%，是全球儿童贫困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挪威在教育方面的资金投入与美国不相上下，也就是说，与其他国

家相比，挪威在教育上投入的资金非常多。然而，在2009年的科学素养国际测试中，挪威的孩子却和美国孩子一样表现平平。这说明挪威的教育也出了问题，而问题的根源并不是贫穷。¹²

与此同时，芬兰人自己就他们在教育上取得的成就给出了模糊的解释。芬兰人告诉我，几百年来，他们一直都非常重视教育，这就是答案。但是，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芬兰只有10%的孩子完成了高中学业？又是为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芬兰农村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之间认知与学习能力上的差距如此巨大？这反映出芬兰人在那些年代对于教育的热情非常不均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另一方面，奥巴马总统和他任命的教育部长都表示非常羡慕韩国的教育体制，称赞备受尊敬的韩国老师和要求极高的家长们。¹³至少从表面看来，韩国与芬兰毫无共同之处。韩国的教育体系受考试驱动，韩国的青少年在学习上花的时间比美国孩子睁着眼度过的时间都多。

关于这些国家的论调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使我一直都想知道在那些考试得高分、辍学率为零、充满大学毕业生的神奇土地上，他们的孩子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芬兰孩子是我一直所了解到的“北欧机器人”吗？韩国孩子也觉得他们享有的教育体制是世界领先的吗？他们的父母对此又是怎么想的？没有人讨论过这些。父母的作用难道不比老师更大吗？

我决定花一年时间，去那些培育“聪明孩子”的国家进行实地考察。我想亲自接触一下那些小“机器人”们。了解一下周二上午10点他们究竟在干什么。当他们结束一天的学习回到家时，父母会对他们说些什么。他们究竟快不快乐。

“外勤特工”

为了与北欧小“机器人”们会面，我需要一些“内部资源”——能

深入观察并帮我完成一些仅凭我一己之力无法做到的事情的孩子们。为此，我招募了一个年轻的“专家团队”来帮忙。

在2010~2011学年，我跟着三位优秀的美国青少年，来到了他们交换留学的培养出了“聪明孩子”的国家。这几个孩子自愿在他们为期一年的交换学习期间，帮助我完成这个项目。我到他们在交换国居住的寓所拜访了他们，并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这几个孩子分别是金、埃里克和汤姆，他们担任着我在寄宿家庭或就餐食堂的“保镖”，自愿成为我在国外的协调人。金离开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到芬兰交换留学，埃里克则是从美国明尼苏达州交换到了韩国，而汤姆是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去往波兰进行交换。他们均来自美国的不同地区，而且他们选择交换留学的原因也不尽相同。通过AFS国际文化交流组织^①、YFU国际学生交流协会^②和扶轮社^③等在世界各地开展交流项目的组织，我认识了金、埃里克和汤姆。

刚开始我只是想让这几个年轻人做我的顾问，但渐渐地他们成了故事真正的主角。他们并不能代表所有美国孩子，其经历也不能反映他们去到的交换国家所有孩子们的真实情况。不过，通过他们的故事，我却发现了官方报道以外的生活。

金，埃里克和汤姆对我坦诚相待。他们不想和我聊什么终身职位政策或者是虎妈们的问题，卸下了成人世界的种种焦虑之后，他们跟我聊了很多其他孩子的故事，对十几岁的青少年来说，同龄人的影响是最大的。他们整天设想着新生活，从寄宿家庭的厨房聊到学校浴室，他们似乎有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

① AFS国际文化交流组织是一个促进国际教育交流的非营利性民间国际组织，前身是美国战地服务团(American Field Service)。——译者注

② YFU国际学生交流协会，全称Youth for Understanding，是一个覆盖全世界60多个国家的国际性非营利教育文化交流机构。——译者注

③ 扶轮社，全称Rotary Clubs，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服务性社团组织。——译者注

我每到一个国家，这里的“外勤特工”都会介绍我和当地的其他孩子、家长和老师相互认识，并和他们一起来完成我的这一项目。比如在韩国，埃里克就把我介绍给了他的朋友珍妮，珍妮的童年有一半时光是在美国度过的，另一半则是在韩国。可以说珍妮对美国和韩国的教育都有一定的了解，因而她回答了一些埃里克答不出来的问题。

为了证实他们提供给我的信息及一些结论的普遍性，我又对上百个交换生的经历进行了调研，既包括来美国交换学习的，也包括从美国交换出去的。这些年轻人都有交换学习的亲身经历，不像其他人只能提供对别的国家教育制度的主观评价。我询问这些孩子对于他们交换的两地的父母、学校和生活的看法，而他们的答案改变了我对美国教育的优势和不足的想法。这些孩子知道美式教育与其他国家教育的不同之处在哪里，而且无论好坏，他们基本上都会直言不讳地如实相告。¹⁴

最后结束项目回到美国，我的真实感受是更乐观了，而不是觉得事情比想象中更糟。很明显，我们在很多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浪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与我所见所闻的芬兰、韩国和波兰的学校和家庭相比，美国的学校和家庭似乎都很困惑和迷茫，美国教育体制最关键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清晰而明确的教育目的。然而我也并没有觉得，美国父母、孩子和老师在以后的日子里，不能够把这个方面做好，甚至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

我所了解到的是这几代孩子受到了他们理应受到的教育。也许孩子们并不总是能将所学知识很好地吸收消化，但他们毕竟还是获得了应有的教育。尽管诸如政治因素、官僚体制、陈旧的教职员聘用体制和家庭教育盲点等许多国家都有的教育弊端仍然存在，但我们在教育上的期待终究都会实现。其他国家——那些走在我前面的国家——也会帮助我们，替我们指明正确的道路。